



100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强军兴军,从古田再出发



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冬日暖阳下,“古田会议永放光芒”8个大字熠熠生辉。

这8个搪瓷烤制的大字其实是份特殊的“礼物”。1969年11月,它们从福州运到了社下山前的廖氏宗祠。用于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会,即古田会议40周年。1929年,在一座四合院式的砖木结构平房里,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

字约3米见方,水泥钢筋为基,立在了廖氏宗祠背后的山坡前。从那以后,“古田会议永放光芒”8个大字便与会址一起,定格为世人所熟知的红色丰碑。

驻足会址前,90多年来的波澜壮阔卷起万千思绪——永放光芒的古田会议,留下了怎样的精神财富?

思想建党

一面绣着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的英文缩写的旗帜,陈列于古田会议纪念馆。

“这是红军组织入党宣誓用的旗帜。”来自古田会议纪念馆的讲解员介绍,古田会议之后,红四军明确了入党新条件。

“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这些“以后新分子入党条件”,就写在古田会议决议里。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不过8年多,虽朝气蓬勃,却也面临困难的局面。

怎样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事实上,从党的七大到党的六大,并未真正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党的六大确立的党章第一次讲了入党资格,但没有具体的党员标准,也没有涉及思想建设。

破题人是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曾提出“无产

阶级的思想领导”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更是开宗明义: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决议列出了红四军内的8种错误观点,逐个论述其具体表现、来源及其纠正方法。会议决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道路。这些原则,不但很快在红四军中得到贯彻,而且随后在其他各部分红军中也逐步得到实行,对以后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古田会议决议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学说初步形成,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体系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为了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毛泽东不断强调教育党员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更开阔的视野提出如何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问题。”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说。

政治建军

古田八甲村松荫堂,是古田会议时红四军前委机关和红四军政治部所在。松荫堂一旁的墙壁上,一行大字赫然映入眼帘——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

政治建军原则的确立,正是自古田会议开始。而对于人民军队而言,政治建军意味着什么?

不妨先看看红四军初创时的构成,主要分三部分:一为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及湘东农军,一为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一为湘南郴、永、宜、资五县农民。

“打起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远不是建军问题的主要内容,更谈不到建军任务的完成。”古田会议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第二支队党代表的粟裕,曾在回忆录中说:“人民军队新创

建,成分复杂,战斗又频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人民军队,正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是什么?党与军队是什么关系?“是司令部对外还是政治部对外?”当时的红四军内部,有关建军的系列重大问题,还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

这一系列问题经古田会议得到了彻底解决。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决议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个三位一体的任务;规定了红军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重要地位,强调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特别是加强政治教育。

古田会议决议,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罗荣桓元帅后来评价:“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会以后,我军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就定型了。”

1985年,曾经参加过古田会议的陈世渠将军重回古田会议旧址,感慨挥毫:“五十六年一挥间,重返故地到古田。决议指明红军路,新征途上志更坚。”

永放光芒

1929年岁末,大雪后的古田银装素裹。古田会议会场内,代表们生火取暖,地板上留下的炭火印记至今可辨。堆堆火光,温暖的是会场,照亮的是前方。

“会后,决议印发到部队,大家学习,一起贯彻执行,并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了整顿。”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参谋长的萧克曾经回忆:“那时,我们都把决议当作党课教材,视为红军法规,也作为检查和衡量工作的标准。不久,部队向武夷山中部及赣南进军,纪律更好了,内部更团结了,战斗力提高了。”

“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实际上是一次群众性的整风运动。”时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四支队十二大队党代表的赖传珠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经过学习,干部、战士的觉悟显著提高,各种不良倾向逐步克服,部队呈现了一片新的气象。”

会议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在古田赖坊村协成店的一豆灯火旁,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结尾处描摹革命未来的诗意味浓,至今令人心潮澎湃:“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一个婴儿。”

思想之光,穿越时空,历久弥新。

“紧紧围绕我军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我军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的生命线作用。”2014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时,对强军兴军作出新的政治擘画,确立了新时代政治建军的方略。

两次会议,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精神相通、主旨相同。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从古田再出发。

如今,走在古田镇的田间地头,当年的红色故事仍然传颂在当地老百姓的口中,也浸润在他们心里。对他们来说,红色记忆不只是纪念馆展板上的文字和图片,更是走向美好生活的不竭动力。

冯春梅 倪光辉 颜珂 黄超

逶迤苍茫的社下山,白墙青瓦的古田会议会址庄重古朴,“古田会议永放光芒”8个大字熠熠生辉。

这里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2014年10月30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习近平总书记31日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31日上午他来到古田会议会址前,亲切接见与会全体代表,随后带领全体中央军委委员一起参观会址。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7次来到这里,大力倡导和弘扬古田会议精神。

古田镇,位于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东北部、梅花山南麓。近现代史上,古田是中国重要的革命圣地。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会在古田召开,即我党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会上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从此,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建党建军纲领性文献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重要论断的《调查工作》……在古田会议纪念馆里,一件件文物、一组组数字,重现了党领导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峥嵘岁月,昭示着军队政治工作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走进古田会议会址,布置简朴庄重的会场、廊柱上战斗性鲜明的标语……革命前辈探寻革命道路时筚路蓝缕、艰辛奋斗的情景,让前来参观的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生研修班成员林斐奕和冯燕娇深受触动。她们告诉记者:“置身其中,能清晰感知先辈们的奋斗足迹和他们坚守信仰的无穷力量。”

福建省文物局局长傅传生说,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赋予这支新型人民军队强大的军魂。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90多年前,古田会议从肃清8种错误思想破题,人民军队由此浴火重生,走向“红旗漫卷”。85年后的2014年,还是这支雄师劲旅,又在这里重聚、思考、接力并走向全新起点,以整风精神解决问题,书写新的历史篇章。

“充分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的生命线作用”“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和殷切嘱托犹在耳。如今,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人民军队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已经迈出坚实步伐。

“今天的古田,奏响了红色圣地、绿色发展的彩色交响曲,围绕红色旅游文旅康养试验区和红色培训产业,推动经济深度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上杭县委副书记、古田管理中心主任邱伟勤说。

新时代新征程,在古田会议光芒照耀下,让我们从古田再出发,向着胜利再出发。

冯春梅 倪光辉 颜珂 黄超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在此确立,新型人民军队在此定型

古田会议永放光芒

伟大转折,打开革命新局面

——记遵义会议



青杠坡红军烈士纪念碑
贵州遵义红花岗区子尹路96号,一幢二层小楼临街而立。

86年前,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指挥红军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在这里谋划中国革命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重大转折点——遵义会议。

历史长河波涛汹涌,关键处往往只有几步。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位于时间轴中点的遵义会议是伟大的转折。由此,中国共产党开始真正独立自主,闯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之路。在这里,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党在政治组织上和军事战略战术上逐渐走向成熟。

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时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

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

86年后,瑞雪初霁,记者赶赴遵义,再次感受这次重要会议的精神力量和伟大转折的历史意义。

航向亟待扭转,路线关乎存亡

那是个冷雨霏霏的冬天,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按照原定计划,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数万红军将士把英魂永远留在了湍急冰冷的湘江。

历史的指针拨至中国革命的这一危急关头。

仗要怎么打,路往何方走?渡过湘江之后,中央红军内部一直存在争论。

1934年12月中下旬,短短半个月,接连召开三次会议。从老山界到黎平,从黎平到猴场,军事指挥问题是争论焦点。不久后,便召开了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会址就在这幢中西合璧小楼的二层,史称遵义会议。会议室保留了当年的原物。房间一面墙壁上的挂钟仿佛仍在摆动。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为“左”倾错误辩解。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分析了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

彭德怀和杨尚昆的住处。从城外匆匆赶来开会的两人,将两条板凳搭上门板,就成了简易床。1月16日,三军团第六师在乌江刀

渡赤水纪念馆讲解员的讲解一气呵成,让人感受到了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高超。

三天会议作出四项决定,革命航船开始拨正航向。

根据在遵义会议陈列馆陈云手稿记载,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最后决心的负责人。随后,经过一系列调整,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四渡赤水出奇兵,战士双脚走天下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刘伯承曾这样回忆。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分别从土城的浑溪口、蔡家沱、元厚等渡口渡赤水河。

四渡赤水的序幕就此拉开。在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多次巧妙地利用地形,出奇制胜,取得了连续的胜利。

为了胜利,根据形势随机应变,迈开铁脚板,变为运动战。1935年3月4日,《红星报》发表的社论斗志昂扬,“只要有正确的军事领导,只要不怕疲劳,勇敢作战,我们就能消灭和战胜任何敌人”。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成功地突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打开了新局面。

渡赤水纪念馆讲解员的讲解一气呵成,让人感受到了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高超。

胜利得来不易。遵义战役中,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在遵义老城侦察敌情时不幸牺牲,他是红军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指挥员;红三军团第五师政委钟赤兵因身负重伤被迫截肢,他就用一条腿坚持走完长征抵达陕北。

实事求是闯新路,开启革命新征程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935年1月19日一别,弹指28年。28年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这样评价:“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遵义市长征学学会会长曾祥锐说,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身在路线、方针、政策上面临的突出问题。

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86年前的那段苦难和辉煌。让人深切地感受到,每一步都生死攸关,每一场会议都是重大抉择,每一个决策都关乎历史方向。遵义会议,决定了一支军队的命运,一个党的命运,以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正是从大局出发,中国共产党人敢于天下先,创造性地调整军事路线,实行符合实际的战略方针,才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探索出中国革命道路的新篇章。

一部百年党史,就是一部不断化解危机、突破险境、抓住机遇、走向胜利的历史。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28年艰苦卓绝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曾渡过无数激流险滩。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是在执着理想信念的感召和坚守中实现的,它再次印证了道路决定前途命运,只有立足实际、独立自主地开辟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才能不断走向胜利。

刘琼 任姗姗 王子潇



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会址确认记

遵义老城,子尹路96号,坐落着一幢青瓦灰砖砌就的两层小楼,这是人们所熟知的遵义会议会址。据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寻找和认定会址颇费周折,用了4年时间。

195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中共遵义地委、遵义地区公署成立了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决定筹建遵义会议纪念馆,于是组织人员着手寻找和确认会址。

当时,一些群众回忆说,遵义老城杨柳街的天主堂可能是遵义会议会址的会址。随后,经筹委会初步认定,“遵义会议地址”的牌子被挂了上去。

这个由法国传教士兴建于1867年的天主教堂,真的是大家要寻找的会址吗?

有关部门赶紧将“柏公馆”的照片、地图等报送中国革命博物馆,请其加以鉴定。

1954年8月,杨尚昆同志电告贵州省省委:“遵义会议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这一线索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说法相互印证。

据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研究员费侃如介绍,1954年11月,经文化部批复,原本设在“柏公馆”里面的遵义地区公安处搬走,“遵义会议地址”的牌子挂到了“柏公馆”的正门上。

1955年10月,会址经初步维修筹展,开始对内部开放。直至1957年7月1日,才正式定名遵义会议会址对外开放。